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丛书主编 / 张志扬 余虹

通往历史的 个人道路

——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

张三夕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总摇摇序

南冥有木，彷徨 乎无为其侧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总序

我们经历的变化，恐怕算得上猿猴年之衰变：从有“辉煌”历史的封建社会向没有“辉煌”历史的现代社会转变。有人言，一个人的成长期要缩影般地重现他的史前史。又有人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两句话似乎特别适合二十世纪九十年。也就是说，只要活在这个世纪，漫长的中国历史也就在将来机缘的吸取中都活过来了，可以成人。我们是有幸的。

然而，那么多仁人志士，在文化史上所留给我们的记录，问题轻重结论，责任消长磨难，如此周期失衡以至我们不敢做传火之薪窃仁人之名，只有退避天涯以求偏隅之安，把“学问”二字做成“贴己”而已。

所谓“贴己”，不是“私房话”，说得雅一点，叫“私人语言”，不是；也不是“贴身”的“绝活”，像武林秘笈；而是“由着性子做”。

海南地处边缘，有意外的人文性质，重力不重，气压不压，阳光、沙滩、海浪，净化着文明的烟尘，少许些技术僭越的骄狂，也少许些历史怀古的忧伤，没有亡灵的召唤，没有寒热的激情，没有牡丹芍药国色天香，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没有泰山极顶东临碣石，没有暗香浮动疏影横斜，没有萧墙刀光古刹钟声，没有小桥残阳流水人家……命脉浮浅，国粹稀薄，伤春悲秋，都不是时候，省了许多牵挂。虽然我们不是图这而来，自然的清新空气，或许淡漠了盘根错节的历史底蕴，倒也疏朗了一点思想的骨架。

“地缘学”是近千年兴起的。西方有海洋文明与土地文化的分别，直到今天，“海洋”仍然是冲淡“土地与血”的潜在抗体。

中国则早有它的属性意识：“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儒家是仁者，志在庙堂之高；庄周恐怕要算智者了，常在南冥秋水之间。

这些我们都说不上。此次海南大学决定人文学科集结首批“丛书”，虽有地缘的形式，却很难说有地缘的特征。如果硬要说出点什么，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贴己”。学问有多种做法，怎么做，全然是各人自己的事；没有受命没有传承没有挂碍的自主姿态倒是共同的。

例如，在文艺学领域，从古典文献到现代文论，从文字触觉到精神生态，各自的伸展，都有别人不到之处。

张三夕的《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按作者的说法，主要点不在于“铺摊子”——校雠学、文学史、史学史、思想史，都有案头功力的磨砺与学理的铺陈；而在于“收摊子”，即借鉴西方学术思想的方法，激发对永恒的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国学的根底上，写一部由问题意识引导的有“个人视角”、有“思想”的思想

史。

余虹的《艺术与精神》，提出文学艺术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精神品质几乎丧失殆尽，这究竟是现代引以为荣的标志，还是需要警惕的病症？为了探寻当代文艺的精神性失重的根源，作者清理了三条道路：①西方现代艺术之思的道路；②中国 20 世纪文艺革命的道路；③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道路。谨作为未来文艺之思的“路标”。

鲁枢元的《猗猗言说》，集中呈现了作者一贯锐意探索开拓的足迹：从 1980 年代中期的“创作心理”、后期的“文学言语”到 1990 年代的“精神生态”，或者说，从“向内转”到“超越语言”到将“精神因素”引入地球生态系统以期为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寻求新的拯救之途。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对当时社会惯性的偏斜，像伊壁鸠鲁的“自由原子”。

耿占春的《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是“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吵”的集语。作者暗中渴慕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然而又只是一种有限个人的话语的写作，因此也是与“一个”、“日期”、“一种语言”、“一个自传式的署名”分不开的，在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收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潜能。这未必只是使作者发生兴趣的梦想地。

又如，在哲学领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关切与开拓，到西方现代哲学的汉语解殖与言说，各自的探寻，也有别人不到之处。

曹锡仁的《中国问题散论》，从 1980 年开始，最初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此追寻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而把中国文化的选择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作为新的研究起

点，正好表达出关切中国现代命运的人文学者治学的价值取向。“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提问方式，也不单纯是政府高层的决策专利，它必须融入专业学者的独特视野，才能合理提供坚实的社会体察与学理根据的保证。

萌萌的《情绪与语式》，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悲剧、易卜生悲剧、贝克特以及现代日常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如何在不断地挣脱历史理性的定式寻求自己生成着的表达。这种“断裂的声音”之捕捉早在 1940 年代中期就逼使作者转向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而且还要反省作为“身体”物性的“二重情绪”同“三类语式”的交互共生性，以通往公共语言何以作个人表达的可能之途。

陈家琪的《经验之为经验》，是对我们最“上手”几乎构成我们生活的“经验”不断流失以至于变成苍白这一事实“震惊”后的思索。于是重提康德式的问题“经验何以成其为经验”与海德格式的问题“作为经验的经验是什么”。作者要像胡塞尔“面对事物本身”样的“面对经验本身”。“经验”不能按已成知识的“经”（在先）与“验”（上手）的相互匡合来理解，经验的普遍性只能在经验自身的构成（生成）中获得描述。

张志扬的《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呈现了“~~1980-1990~~”十年的主要问题与思路，其实说起来只一句话：“如何走出‘只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本质主义与‘怎样都行，怎样都不行’的虚无主义的循环”。提出被还原了的“偶在论”，不过是一种尝试，也还只是消极的检测与防御，对包括哲学在内的现代性理论思考，只能算作前提性的准备。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技术的图象，以至我们的思维也开始在数码与图象之间训练有“数”。或许工于计算的人有福

了。

幸好人是隐含否定于自身的偶在者，他一方面要接受数码与图象的度量而不得不规范化，另一方面，他又难免例外地要承受大地与苍穹的跨度，使那想象的空间连人不可兼并不可让度的隐私，终究守护着人可偏离的自由。或许善于例外的人有福了。

生长并传播教育的教育之地，现在有最功利的企图，没有比这更跛足短视的不幸。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以为它能靠自身的自然增长而脱去科技神话的巫魅。可是它们忘了，它们的“不完全定律”是不可能为自己寻找到“第一推动力”的，无论是宇宙的内和外。

海南的信使，但愿他有幸从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走来，只需带着清新的空气。我们感谢这一片土地。当然也感谢海南大学注视文科的精神——“山不在高，有神则灵；海不在深，有珠则润”。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一个人的情形和另一个人的情形一样。然而只不过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误入歧途。”

相对那些自明的“高速公路”，“林中路”常常是“误入歧途”的，所以“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

或许，这正是我们向往的吧。

“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

前摇摇言

在 20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有机会把自己在 20 世纪最后 20 余年的学术发展轨迹以结集的方式作些回顾和清理，对我个人来说，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中国学术思想史是我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本书的内容大都写于 20 世纪 80 年代，它大致反映了我的一部分学术旨趣和走向。历史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过去，但“我们”并不共同拥有通往历史的同一道路。每个人通往历史的道路都有所不同。有些道路可能走得通，有些道路可能走不通或中断；进入这条道路也许满载而归，进入那条道路也许无功而返，甚至半途而废的情形也是司空见惯的。因此，一个人研究什么问题，不研究什么问题，或者放弃什么问题，都可以有一些说道。这里，我想把个人的一些思考以及研究背后的东西向有兴趣的读者作些简要的说明，也借机看一看自己走过的道路，并打量一下在路上留下的痕迹。

“中国学术思想史”是个大题目，进入这个大题目有两种不同的角度或方式：一种是纵论式或通史式。我自己曾先后有过写中国文学接受史、史学批评史和思想史等专门史的雄心和计划（有些计划后来被放弃，如中国史学批评史），但从来不敢奢望写一部综合而全面的中国学术思想史，我不具备写这部“史”的能力和条件。另一种是“散论”式或

专题式。收在这个集子的文章就是一些“散论”或专题研究。它们虽然按照朝代序列排列起来，但其中并没有严格的学术思想史的整体联系或内在逻辑，因此，只能冠以“散论”。

以上开头的话算是“正名”。

一、关于史记人物

我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关注，首先集中在司马迁的《史记》。

在我此生精读典籍书目中，《史记》排在第一。早在文革后期，我就读过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的纪传部分。上研究生时，对《史记》又下过一些功夫。我曾认真细读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并将该书辑录的《史记正义》佚文一条一条地过录到我自己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上（当时张衍田的《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一书还没有出版）。我为什么高度重视司马迁的《史记》呢？

我认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少数划时代的人物，而多数则是时代之中的人物。划时代人物起着承前启后的转折性作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司马迁就属于这样的人物。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意义在于他把“先秦”和“后秦”（确切地说，是西汉至清代）作了一种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区分。“先秦”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时段，是司马迁用《史记》所确立起来的。《史记》是司马迁所了解和认识的先秦史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总结，先秦没有人能够完成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虽然都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作了一些批判性总结，但其气象与规模却不能与《史记》相比。

司马迁的重要性在于“启后”。他确立了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知识的范式，并奠定了中国历代纪传体正史的学术传统。冯友兰早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以汉武帝、董仲舒为界，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的时代与“经学”的时代。司马迁与汉武帝、董仲舒同时，如果仿照这种划分，也可以将司马迁以后的时代（即“后秦”）命名为“史学”的时代。而“经学”和“史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假如把“先秦”的“子学”时代理解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原创阶段，或者非对象性研究的“思想”阶段，那么，“后秦”的“经学”和“子学”时代，则可看作是偏重对象性研究的“学术”阶段。

我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之所以从“后秦”开始，而不从“先秦”开始，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一是感到溯源困难，尽管先秦的书大都读过，还写过老、庄死亡意识的分析文章，但仍感觉要说明“子学”的来源实在不易，考古学的知识准备也不够；二是多少受到一些陈寅恪先生治“不古不今”（指魏晋至隋唐）之学的影响，当然，我不想限于“中古”（陈先生后来也越出“中古”，如《柳如是别传》）；三是“后秦”文献足征，可以通观，后秦学术思想史是在大一统的专制政体下发展起来的，有某种“学统”或线索可以考察，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看作这种“学统”的自然起点。

我对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取全面的、一般性的研究，而是选取一定的角度切入，我切入的角度就是人物类传。在纪传体中，将人物传记作类型化处理，这是司马迁的创造，为后来史家所继承。有些人物类型有很强的延续性，如《儒林列传》，从《史记》到《清史稿》一直延续下来，它们提供了中国儒学发展史的一种线索；有些则很快就中断

了，如《游侠列传》，《汉书》以后就从正史中消失而转向了文学和民间。弄清楚这些延续和中断，对于深入考察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某些传统是很有价值的。我研究《史记》人物类传的指导思想是“回到文本自身”，直接面对文本细读，进而从中发现文本自身可能向我呈现的问题，寻找因长期学究式阅读可能遗忘的历史感觉。我在 1980 年代发表过几篇相关论文（如论游侠、循吏和酷吏等），收在这里的是 1980 年代所写的猿篇，加上未发表的草稿和大量的读书札记，已经有几十万字了。我对类传的研究已从《史记》扩展到二十五史，这些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一本专著——《作为一种类型化的群体史》，原计划 1988 年底以前完稿，现在看来要拖到 1991 世纪了。

二、关于魏晋风度

如果说我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注重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性人物，那么，相应地，我同时比较注重有转型意义的历史时期，魏晋就是这样的时期。

魏晋时期的魅力，对我来说，首先来自百读不厌的《世说新语》。记得 1982 年匆匆南下时，随身携带的简单行囊里，除了几本工具书外，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世说新语》。我认为，这本书把古代汉语状情写意的表达能力发挥到某种极致，寥寥数语，就把一个人的神态风姿写得活灵活现，而且寓意深远，没有几本古代汉语的典籍能够达到这种水准。当然，我们欣赏《世说新语》时，应对某种文人趣味保持一定的警惕。此是后话。应当说，主要是《世说新语》这本书使“魏晋风度”成为一种特定时代的“体验结构”和“精神气质”（借用舍勒语）。

“一部好书可以命名一个时代”，这是我评论李建中君的大作《乱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结尾时说的话。

我将魏晋风度作为转型时期的学术思想现象来展开研究，还受到挚友马良怀教授的《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一书的激发。良怀认为，魏晋风度是汉代天人感应的权威思想崩溃和宋明理学的权威思想重建中的一种转型形态。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在评论他的著作的同时，我个人也对魏晋风度作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于是，便有了《魏晋风度何为？》等文的问世。

魏晋时期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三国志》。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期思想界、知识界异彩纷呈，那就是春秋战国、魏晋和明末清初（或晚明）。这是由这三个时期特殊的政治、军事格局所造成的。魏晋风度的形成直接导源于三国鼎立的分裂形势。要深入研究魏晋时期的政治、军事及学术思想，必须深入研究《三国志》。这不仅因为它孕育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还在于它是魏晋之际收集史料最为详备的史书。我在1980年前后曾参与《三国志辞典》的编写工作，写过几万字的词条，当时把《三国志》翻了几遍。1985年应师弟李晓明的约请，负责《三国志》的汇校工作，又把《三国志》认真地读了几遍。这次整理的收获，除了文字校勘方面外，还对中国战略思想的资源等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写了不少札记，《“隆中对”与中国战略思想问题》就是其中的一篇（在一家报纸上发表时改名为《我们需要新的“隆中对”——重读 三国志 札记》）。

魏晋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相当复杂、精彩，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不逊色。建安七子和三曹自不待多言，东晋诗人

陶渊明、谢灵运也很有个性。我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没有展开全面考察，而是受海德格尔晚期诗学思想的启发，想从存在论的角度把握一下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于是，就选择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和谢灵运的《山居赋》作为个案，来探讨一下“诗意地栖居”的问题。还有一些作家作品列在计划表上，没有动笔。关于陶诗，还写过一篇《言说自然与自然言说——说“陶潜体”》，因为不太满意，就束之高阁，后来连草稿也找不到了。

三、关于唐宋文史

我上大学时就喜欢唐宋文学。几位古典文学老师对我很有帮助。我向韩珉老师借阅过线装本的《唐诗纪事》；跟张国光老师研究《顺宗实录》时，还翻阅过《两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考上研究生后，便与唐宋文史结下不解之缘。我的两篇学位论文，都与之相关。我在南大读的硕士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方向是唐宋诗。在程千帆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本朝人注本朝诗这一在宋代才出现的独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收在本书中的《宋诗宋注管窥》，就是我长达 10 万字的硕士论文《宋诗宋注纂例》的前言。当年答辩委员会主席段熙仲老先生对拙稿给予很大鼓励，认为该文已达到出版水平。按当时计划，我的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即硕士论文，另一部分为《宋诗宋注版本考》（已收集了不少资料）。但硕士毕业后到湖北大学任教，工作很忙，不久又去攻读华师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因此“宋诗宋注版本考”的研究也就搁置下来了。这一“搁”就是十几年，今后也不知道何时能把它“捡”起来。不过，因宋诗宋注的研究，曾引发我对中国解释学传统的兴

趣，我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一些理论性层面和技术性层面的问题作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这里无法详谈。关于宋诗，我还辑佚过“李雁湖诗集”。

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程千帆先生的《史通笺记》（~~1980~~）和张舜徽先生的《史学三书平议》（~~1980~~）给了我最初的选题刺激。我认为，在中国历史编纂学比较发达的背后，暗含着史学理论的相对薄弱，而《史通》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研究《史通》并不想止于《史通》，而是想进而开创或扩展一门新的学科分支——中国史学批评史。这样才能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相对应。收在本书中的《史通研究与建设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构想》，是我的博士论文《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上篇的导论。这篇博士论文共 ~~10~~ 万字，台湾文津出版社 ~~1980~~ 年出版了繁体字本，因大陆似未有销售，很少见到，有朋友索要，也无法满足。这里转载这个导论，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对我的一些想法能有所了解，进一步来推动史学批评史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导论中尚存在个别值得再推敲之处，如史论和史评的区别，但书既已出版，我想仍保留原样的比较好，它是我博士阶段学术思想的真实记录。

本书中所收的另外两篇有关《史通》的文章，也需要略加说明。谈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成就一文所说的一个误说，是指自四库馆臣以来，一直误认为《永乐大典》未收《史通》。我对此产生疑问：《永乐大典》收书繁多，即使《史通》有些异端思想，它怎么会不收《史通》呢？通过通读中华书局出版的残存的全部《永乐大典》，我发现其中就有《史通》，从而订正了这一名家们深信不疑的误说。这次经验告诉我，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往往会出现一

些相沿已久的说法，不管其来自多么权威的大学者，只要这些说法有不合理的因素，就有必要重新加以检核或考订。另一篇文章是《史通三家评校钞》。这篇文章是受程千帆先生嘱托而完成的。《学术集林》（卷十一）发表时有程先生的题记，这里仍然加以保留。所谓三家，是指纪昀、杨守敬和向宗鲁。这三位学者有关《史通》未发表的批校稿，比较珍贵，今人已不易看到。我通过湖北图书馆珍藏的一个善本，做了一些转录和整理工作，相信它对治《史通》者以及治纪、杨学术思想者有一定帮助。

四、关于明清学术

我对明代学术的兴趣，首先来自明代的四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除《红楼梦》外，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为什么主要产生于明代，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友人王齐洲教授从大众文化的角度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我在本书里向读者作了一些推介。我认为，长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与人们的生活样式究竟有那些文化上的联系，还需要多方考察。我们要摆脱习以为常的教条，才可能对这四大奇书作出新的理解。比如对《三国演义》，不必再纠缠于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比例关系（所谓三分虚构，七分史实），而应中止这类问题。我曾思考过历史与想象的多重关系，也许可从《三国演义》入手，来认真评估一下中国古代小说家对历史的想象能力和想象空间究竟有多大，并且还可以反观一下中国当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想象力方面的实绩，比较一下西方的同类小说（如《哈扎尔辞典》）的状况。假如能尽可能地拓展我们的视野，我们对明代的长篇小说可能会获得一些新

的认识。

我对明史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政治史。我曾短期参与过《明实录类纂》的集体项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仅在写法上吸引我，还在于该书大量利用了《明实录》。因此，我也粗略地翻过《明实录》。当时设想，如果认真地把几十册《明实录》细读一遍，再结合其他一些史料，有可能对明代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方式的细微之处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后来因忙于别的项目，这个设想也没有实施。明代的政治经验中有极具现实性的问题如吏治的腐败问题。朱元璋采取极严酷的措施惩治贪官污吏，贪污银两以上者均斩首、剥皮。我经常想象当年剥贪官污吏皮的“皮场庙”的情景。为什么如此残酷的刑罚，也不能防止明代吏治的腐败？（明初的情形稍好一点。）牟宗三说，中国古代社会“有吏治而无政治”（见其《中国文化的特质》），那么，“吏治”和“政治”究竟有什么区别？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国的政治经验怎样才能避免重复，找到长治久安的有效办法？我相信，明史会给我们在制度建设和其他方面以有益的启示。

除了明代政治史外，王阳明的心学也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一直想搞清楚一个问题：王阳明的书为什么会对近、现代的一些杰出人物如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蒋介石、郭沫若等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我通读过《王阳明全集》，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想清楚。郭沫若曾想自杀，是王阳明的书救了他。王阳明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康德”，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居官教授的人生经验，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引起过我的思索。我曾计划将《论语》、《象山语录》和《传习录》三书仔细比较一番，看一看中国古代语录体的入思方式究竟有哪些得与失。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中国思想史，也许能别

开生面。

老实说，关于明代的学术思想，除了一些“悬念”，我并没有写出什么象样的东西值得在此赘述。

出于专业的需要，相对于明代学术而言，我自以为对清代学术还是比较熟悉的。

四年前，在读硕士研究生时，程千帆先生给我们讲授“校雠学”这门课，要求我们熟悉清人有关文献考证方面的著作。因此，象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的全史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隋书经籍志考证》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都阅读过，有些书还做过学年论文（如《四库总目提要》）。后来读博士研究生时，又受到张舜徽先生的影响，看过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清代扬州学记》、《清儒学记》、《清人笔记条辨》、《旧学辑存》等著作，深感张先生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清学”。跟张先生求学多年，耳濡目染，对“清学”的精神多少有一些较真切的感受。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到清代才真正具备成熟的形态。对学术的某种“职业”态度也是在清代才全面形成的。19世纪的国学大师们，没有一个不受到清学的滋养。我认真研读过梁启超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觉得，在这两位大师的基础上，如果有人能用现代性眼光来重新撰写一部“清代学术史”，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不过，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必须接受一定的旧学训练，就象章太炎、梁启超早年在书院所受的训练一样。没有这类训练，恐怕对清学史的研究或描述只能是“概论式”的或表层的。遗憾的是，在近 20 年的高校教育体制下，几乎没有年轻的学者受过这类训练。仅就此而言，“清学”的传统，实际上已经发生断裂。